

# 生命的开花

## 巴金《随想录》论

黄 科 安

**摘 要** 巴金的《随想录》不仅是我国新时期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可视为代表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由“放逐”到“回归”的心路历程。他倡导的“讲真话”，真正体现了自觉的人的意识，即真诚的人格、严厉的自审意识和独立的理性批判精神，构成了《随想录》人文主义内涵的深厚意蕴。

**关键词** 散文 随想录 讲真话 人文精神

马克思说：“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巴金的《随想录》用倡导“讲真话”的方式，真正体现了自觉的人的意识，是“五四”散文个性精神的回归；是我国新时期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视为代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由“放逐”到“回归”的心路历程。它给文坛带来了震动和影响，其思想和文学价值不言而喻。

—

“文革”劫难结束之初，巴金成为率先打破往昔“寓悲愤于沉默”个性的作家之一，挥毫执笔写下了《一封信》、《第二次解放》、《除恶务尽》、《望着总理的遗像》、《“最后的时刻”》等文。这些文章既有讨伐罪恶的檄文和张扬正义的宣言，又有深情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之作，曾一时引起文坛的普遍注意，产生了广泛的社会效应。为此叶圣陶还赋诗称赞巴金“挥洒雄健犹往昔”，“伫看新作涌如泉”。但巴金的笔触很快就超出单纯的政治声讨和对伟人挽悼的浅层面。“随想”作为散文文体之一种，为他展开更为自由的精神领域和广阔的艺术空间。他站在“文革”废墟的边缘，开始了《随想录》的创作。

黑格尔说：“感性的东西是个别的，是变幻的；而对于其中的永久性的东西，我们必须通过反思才能认识。”经受过历史的沉浮，经历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文革”炼狱，巴金获得了对历史的“反思”。他说：“五十年代我不会写《随想录》，六十年代我写不出它们，只有经历了接连不断的大小政治运动之后，只有在被剥夺了人权，在‘牛棚’里住了十年之后，我才想起自己是一个‘人’，我才明白我也应当像人一样用自己的脑子思考。”这正如当代著名哲学人类学家 H·普列斯纳所说：“只有失望的苦酒才使人变得敏感，痛苦是精神

收稿时间：1998 9·17

的眼睛。”劫后余生的巴金，饱含着血泪，扭住“文革”话题不放，他要为历史和后人建起一座“文革”博物馆，表现了一位中国知识分子的真诚和良知。

在《随想录》中，巴金愤怒斥责和抨击对人性、人的尊严的践踏的丑恶现象。他指控“文革”十年是“人兽转化”、“人吃人”的疯狂年代，“牛棚”林立，“虎狼”肆虐。他本人是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瞬间沦为“罪人”和“贱民”。他说：“并不是我不愿意忘记，是血淋淋的魔影牢牢地揪住我不让我忘记。我完全给解除了武装，灾难怎样降临，悲剧怎样发生，我怎样扮演自己憎恨的角色，一步一步走向深渊，这一切就像是昨天的事，我不曾灭亡，却几乎被折磨成一个废物，多少发光的才华在我眼前毁灭，多少亲爱的生命在我身边死亡。”那些丑类为虎作伥，以整人为乐，多少人在具有“中国特色的酷刑”——“上刀山、下油锅”、“触皮肉”和“触灵魂”的折磨和侮辱下致残，致死。每每回忆起那些丑类，他就不觉地要感到“生理上的厌恶”。那些丑类的暴行甚至连一条狗也不轻易放过，他的《小狗包弟》便展现出一幅血淋淋的图画：

批斗结束，他走不动，让专政队拖着游街示众，衣服撕破了，满身是血和泥土，口里发出呻吟。认识的人看见半死半活的他都掉开头去。忽然一只狗从人丛中跑出来，非常高兴地朝着他奔去。它亲热地叫着，扑到他跟前，到处闻闻，用舌头舔舔，用脚爪在他的身上抚摸。别人赶它走，用脚踢，拿棒打，都没有用，它一定要留在它的朋友的身边。最后专政队用大棒打断了小狗的后腿，它发出几声哀叫，痛苦地拖着伤残的身子走开了。……回到家里什么也不吃，哀叫了三天就死了。

巴金在这里用“狗”作为非人年代的参照物，以其对主人的忠诚与情义，衬托出人世间的冷酷与残暴。从而以一个特殊的角度——狗的不幸命运，来表达作家对“文革”的愤懑。

那么，十年的“文革”悲剧怎样会上演呢？巴金说：“大家都在豪言壮语和万紫千红中生活过来，怎么那么多人一夜之间就由人变为兽，抓住自己的同胞‘食肉寝皮’。”他认为我们必须有责任、有义务弄清楚它的来龙去脉，探究产生这一悲剧的深刻根源，并以此为鉴，把来路堵死，确保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不再重演。这就是黑格尔所说：“要获得对象的真实性质。我们必须对它进行反思。唯有通过反思才能达到这种知识。”巴金以自己的慧眼和敏感，深刻地剖析了“文革”产生的根源。《一颗核桃的喜剧》便是他这方面探索的代表作。文中摘引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中的一则故事来艺术比拟“文革”狂热的造神运动。这是围绕一位沙俄皇位继承人吃剩的一颗桃核而上演的一出喜剧。巴金指出，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这种“喜剧”也是经常上演的。不过“皇位继承人”给换上了“中央首长”，或是林彪，或是江青，甚至别人。桃核给换了别的水果，或是其他的东西如草帽之类。“当时的确有许多人把肉麻当有趣，甚至举行仪式表示庆祝和效忠。这种丑态已经超过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沙俄外省小城太太们的表演”。巴金在这里以犀利的笔墨，纵横结合的方式，深刻地揭示“四人帮”及其种种倒行逆施同封建专制和封建传统的根深蒂固的内在联系，指出这种狂热的造神运动、个人迷信实质是宗教狂热，是封建的东西。诚然，“文革”的产生，原因是比较复杂的。但巴金能抓住问题的一个方面，振叶寻根，观澜索源，显示他思想的独到和文笔的锋芒。

作为“五四”之子，巴金始终是一位站在时代前列的反封建斗士。他一生的创作紧紧维系着二十世纪中国和世界所经历的种种风云变幻。他说：“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

会进步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努力，它们都是我最大的敌人。”<sup>1</sup> 建国前，他以一位反封建战士的身份驰骋在文坛上，先后写下了众多的文学作品，激起千千万万读者的同情和觉醒。今天，他站在“文革”的废墟上，仍然一如既往，大声疾呼：“我们这一代人并没有完成反封建任务”，“今天还应当大反封建，今天还应当高举社会主义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前进”。<sup>2</sup> 十年劫难后，巴金年逾古稀，但变得更加心明眼亮，他意识到封建地主阶级虽然已被打倒，但封建毒瘤并未彻底根除，它在某一个特定时期还会泛滥成灾。尤其他目睹社会上出现的种种怪诞丑恶现象，形形色色的歪风邪气，更表现了极大的忧虑，激于正义而加以针砭。《随想录》中就有说《小骗子》、《再说小骗子》、《三谈骗子》、《四谈骗子》等系列文章，集中探讨“骗子”得以产生的原因和根源，抨击当前社会存在的特权思想。在《小人·大人·长官》一文中，巴金由简单的生活现象入手，深刻地批驳了“长官信仰”。他指出人们实际上长期以来遵循着这么一个简单的逻辑，即“小孩相信大人，大人相信长官。长官当然正确。”正因为如此，“多少人把希望寄托在包青天的身上，创造出种种离奇的传说。还有人把希望寄托在海青天的身上，结果吴晗和周信芳都‘含恨而亡’。”巴金在这里把国民素质的改造摆到桌面来探讨，从而提出要重视人的思想现代化这一深刻的命题。总之，巴金这些精辟的论述，显示作家的真诚勇气和真知灼见，而这便构成了《随想录》具有鲜明的人文主义的批判精神，它的价值和影响远远超出作品本身和文学范围。

## 二

马克思认为，真正的批判和反思，是在自我批判基础上进行的。他说：“基督教只有在它的自我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所谓在可能范围内准备好时，才有助于对早期神话作客观的理解。同样，资产阶级经济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社会、古代社会和东方社会。”<sup>3</sup> 巴金的《随想录》就是从自我解剖入手而解剖社会。他说：“我是从解剖自己，批判自己做起的。我写作，也就是在挖掘，挖掘自己的灵魂。必须挖的更深，才能理解更多，看得更清楚。”<sup>4</sup> 他审视自己的灵魂是严厉的，哪怕是心灵深处的小小隐秘，也要提示出来，公诸于众。因此，那种敢于与历史分担责任，把自我解剖与历史反思相结合的精神，正是巴金晚年的精神。他的《随想录》表现出来的人格境界，使人油然而生出“高山仰止”的感情。有的学者认为它的经典性就在于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sup>5</sup>

古希腊哲学的重要名言就是“认识你自己”；笛卡尔沉思的最后结果，便是我知道我在怀疑这是不能再排除的，所以“我思故我在”。巴金思想的深刻之处在于把自己摆进历史的反思中去，正视自己在这场民族劫难中所表现出来的灵魂弱点。在《十年一梦》一文中，他把自己在“文革”的心路历程，艺术地概括为：“奴在心者”——“奴在身者”——“我回到我自己”。这三层精神变化特征也代表着当代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精神由放逐到回归的典型心态。

“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鄙”，这是林琴南翻译英国小说《十字军英雄记》中的一句话。没想到这句话竟成了巴金在“文革”中的自我写照。他这样剖析说：

六六年九月以后在“造反派”的“引导”和威胁之下（或者说用鞭子引导之下），我完全用别人的脑子思考，别人大吼“打倒巴金！”，我也高举右手响应。

.....我还有通过吃苦完成自我改造的决心。我甚至因为“造反派”不“谅解”我这番用心而感到苦恼。我暗暗对自己说：“他们不相信你，不要紧，你必须经得住考验。”每次批斗之后，“造反派”照例要我写“思想汇报”，我当时身心十分疲倦，很想休息。但听说要马上交卷，就打起精神，认真汇报自己的思想，总是承认批判的发言打中了我的要害，批斗真是为了挽救我，“造反派”是我的救星。

巴金把自己在“文革”初的这段表现，概括为“奴在心者”的精神特征，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隶”。这番灵魂的自审和拷问的确令人战栗，它犹如阿 Q 打了自己脸上——巴掌，又仿佛打了别人一样似的，可怜又可鄙。这种“奴在心者”的表现，折射出当代知识分子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精神的溃败和处在“非我”状态的窘境。

从六九年起，巴金慢慢发现周围所进行着是“一场大骗局”，他身上那么一点点“知识”开始发挥抵制“迷药的效力”，他再也无法用别人的训话来思考。他说：“我不再相信通过苦行的自我改造了，在这种场合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道路也救不了我。我渐渐地脱离了‘奴在心者’的精神境界，又回到‘奴在身者’了。换句话说，我不是服从‘道理’，我只是服从于权势，在武力下低头，靠说假话过日子。”这是巴金摆脱奴隶哲学的开端，他不再是为了赎罪，而是为了弄清是非。只不过他屈服于“武力”，是“奴在身者”。“四人帮”灭亡后，巴金迎来了新生。他说：

我经受了几年的考验，拾回来“丢开”了的“希望”，终于走出了“牛棚”。我不一定看清别人，但是我看清了自己。虽然我十分衰老，可是我还能用自己的思想思考。我还能说自己的话，写自己的文章。我不再是“奴在心者”，也不再是“奴在身者”，我是我自己。我回到我自己身上了。

由“奴在心”到“奴在身”，再到“我是我自己”，这是巴金在“文革”中所走的心路历程，它典型地说明这么一个事实：“五四”反封建的民主运动远未完成，摆脱奴隶哲学，以及重建知识分子的人格精神，仍是当今中国知识分子迫切任务。正如马克思说：“人只有在成为他自身的主义的时候，才能将自己当作独立的存在物，而且只有当他把自己的存在归之于自身的时候，他才是自己的主人。”<sup>1</sup>

在巴金看来，重建知识分子的人格精神关键问题是“讲真话”。“讲真话”应当视为中国知识分子人格复苏的基本准则和情感表达方式，它包括真诚的人格、严厉的自审意识和具有独立的理性批判精神。这三方面自始至终流贯在《随想录》之中，作为他探索人类精神家园的独特思考。因此，当我们阅读这部“当遗嘱写”的《随想录》时，我们不能不触及到巴金这种思想在历史转折期的进步的脉动，同时也为他真诚的大勇和伟大的人格所震撼。

讲真话，是巴金劫后余生对“贩卖假话”、“灌迷魂汤”、“吹牛说谎”的十年骗局的大彻大悟。他指出，说真话关键是“不隐瞒，不掩饰，不化妆，不赖帐，把心赤裸裸地掏了出来”。<sup>1</sup>那么，真诚的人格应视为讲真话的基石。在“随想录”中，巴金时时把自己摆在平等的地位上和读者娓娓叙谈，坦诚真挚，亲切平易，让人读后深受感染。以《大镜子》为例，巴金通过日常起居照镜子一例生发开去，述说如何正确摆正自己位置的感受。他幽默地说，对于照镜子自己并不感到愉快，那副“尊容”叫人担心：憔悴、衰老、皱纹多、嘴唇干瘪……。有一个时期干脆不照镜子，不见自己的“尊容”，别人说“焕发了青春”，自己完全接受，甚至进一步幻想“返老还童”，开会的通知不断，索稿的信件不停，似乎都把自己忘

记了。直到自己有一天发现身体垮了，再到镜子里一睹“尊容”，才发觉镜子对他是讲“真话”。经过这一番折腾，巴金摆正了自己的位置：

每次走过它前面，我就看自己那副“尊容”，既不神气，又无派头，连衣服也穿不整齐，真是生成劳碌命！还是规规矩矩地待在家里写吧，写吧。这是我给自己下的结论。

象这样生活事例信手拈来，毫不掩饰地坦露自己赤诚的心，确实做到不虚美，不隐恶，把心掏给读者。正如他说：“作家在生活中做的和创作中写的要一致，要表现自己的人格，不要隐瞒自己的内心。”<sup>11</sup>人品和文品的一致，使巴金的为人和为文得到和谐的统一，这是巴金人格力量的所在。巴金的真诚，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心。

讲真话，更表现在作家有无勇气坦白无私的自剖。巴金说：“挖别人的疮，也挖自己的疮”。<sup>12</sup>在《随想录》中，巴金的自审意识特别的强烈，他完全把自己当作一位债主，要在晚年期间以写作的方式，一笔一笔地偿还。说实话，作为一位“文革”受害者，巴金最有资格表明自己的无辜清白。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相反却把批判锋芒引向了自己，进行着严厉的自我解剖和反思。他为自己在不正常的时期所写的“豪言壮语”、“违心之论”不能容忍自己；为自己在政治运动中，为了保全自己，跟在别人后面丢石头而羞愧；他为老舍的死而难过，认为我们不能保护一个老舍，怎样向后人交代呢？他也为自己不能保护妻子而痛心；为不能保护小狗包弟的性命而自责；他甚至把笔触伸入自己的潜意识——梦境世界，来剖析自己：

我在梦中斗鬼，其实我不是钟馗，连战士也不是。我挥动胳膊，只是保护自己，大声叫嚷，无非想吓退鬼怪。我深挖自己的灵魂，很想找到一点珍宝，可是我挖出来的却是一些垃圾。<sup>13</sup>

读着巴金这类自剖的文字，令人想起鲁迅在1926年写的《穷人·小引》中，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玛卓夫兄弟·手记》中的一句话：“将人的灵魂的深，显示于人的”，鲁迅指出：“使人受了精神底苦刑而得到创伤，又即从这得伤和养伤的愈合中，等到苦的涤除，而上了苏生的路。”<sup>14</sup>巴金的《随想录》也具有这样的功效，这类严厉的自剖文字促人深思、引人警策，显示巴金作为一位思想家在剖析知识分子精神时的坦诚与深度。

讲真话，就是要“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sup>15</sup>因此从高一层意义上说，讲真话不仅是指作家内心的真诚流露，更重要还应包括人的独立思考。巴金在反思十年的“非人生活”时，曾作这样的检讨：“只有盲目崇拜才可以把人变成‘牛’，主要的责任还是我自己。”<sup>16</sup>“我还想说：‘一个中国人什么时候都要想到自己是一个人，人！’”<sup>17</sup>巴金的这番话很有深意，这些以“血的代价”换来的“真话”，凝结着深刻的教训和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再三深思。巴金在《随想录》里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怀着强烈的正义感和一个老人稀有的勇气，发出自己的声音：

我所谓“讲真话”不过是“把心交给读者”，……只要一息尚存，我还有感受，还能思考，还有是非观念，就要讲话。为了证明人还活着，我也要讲真话。讲什么？还是讲真话……我想起安徒生的有名的童话《皇帝的新衣》。大家都说：“皇帝陛下的新衣真漂亮。”只有一个小孩讲出真话来：“他什么衣服也没穿。”

看来，讲真话需要作家有真诚的勇气，才能越过许许多多人为的障碍，顺着自己的思路前

进，得出应有的结论。

不过，真话要讲得深刻，分析得透彻，还需要作家具备成熟的智慧，也就是说具有独立的理性批判精神。这是衡量知识分子人格复苏的重要标志。鲁迅曾说过：“必须正视现实，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作，敢当。倘使并正视而不敢，此外还能成什么气候。”<sup>m</sup>巴金正是这样，对“本身的矛盾或社会的缺陷所产生的苦痛”，身体力行，敢于歌哭，勇于剖析，做到“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的作品来。<sup>n</sup>不过作为清醒、独立的现实主义者，他的一切批判应该是为理想而批判，应该是位为追求一个合理人生、合理社会的杰出歌手。巴金尊敬卢梭，在于卢梭敢于讲真话，维护着真理和正义的尊严，是一位拿着“出”和“草帽”为人民不辞辛苦的“日内瓦公民”。<sup>o</sup>他崇尚托尔斯泰，不仅认为托氏是“十九世纪世界文学的高峰”，而且代表着“十九世纪世界的良知”。<sup>p</sup>从巴金的身上，我们不难看出卢梭、赫尔岑、托尔斯泰、高尔基、鲁迅等思想先哲对他的影响。他们在追求真理、维护正义这一点上是相通的。在《随想录》创作中，巴金不顾自己年迈多病，一笔一划地写着他的随想，一点一滴地记录着他真诚的思想和感情，表达他对祖国对人民的爱。巴金说：

人们的幸福生活给破坏了，就应当保卫它。看见人们受苦就会感到助人为乐。

生活的安排不合理，就要改变它。看够了人间的苦难，我更加热爱生活，热爱光

明。从伤痕里滴下来的血一直是给我点燃希望的火种。<sup>m</sup>

巴金以一位正直知识分子的道义和良知，确立了自己在历史转型期的思想文化史上的前沿位置。他的《随想录》也将成为留给后人一份弥足珍贵的精神产品，值得人们重视和研究。（作者为泉州师专中文系副教授 泉州 362000）

#### 注释：

“寓悲愤于沉默”，是陈仲贤评巴金语，转引自巴金《“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

转引自巴金《我的责任编辑》。

、黑格尔：《小逻辑》，第87页，74页。

巴金：《随想录·合订本新记》。

H 普列斯纳：《新的眼光》，斯图加特1982年，第171、172页。

巴金：《“文革”博物馆》。

巴金：《我的噩梦》。

巴金：《说真话之五》。

v 巴金：《我和文学》。

w 巴金：《五四运动六十周年》。

k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8、109页。

y 巴金：《随想录·日译本序》。

z 王尧：《乡关何处：20世纪中国散文的文化精神》，第6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转引《人道主义思想论库》，罗国杰主编，第735页，华厦出版社1993年版。

l 巴金：《序跋集·跋》。

ll 《巴金谈文学创作——答上海文学研究所研究生问》。

tt 巴金：《探索集·后记》。

巴金：《说梦》。  
鲁迅：《集外集·（穷人）小引》。  
巴金：《真话集 后记》。  
巴金：《病中（三）》。  
巴金：《怀念叶非英兄》。  
鲁迅：《坟 论睁了眼看》。  
巴金：《再访巴黎》。  
巴金：《再认识托尔斯泰》。  
巴金：《未来（说真话之五）》。

（责任编辑 戴南兴）

---

（上接第 17 页）的目的，重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学生从“要我学”到“我要学”。教学方法改革的重点应放在培养学生多方面的能力、综合素质的锻炼和培养。对师范生来说，特别是教学技能技巧的训练和提高。

再次，我们可在一些具体操作上作一些尝试和努力。比如，教师可充分发挥学校图书馆丰富藏书的优势，结合专业特点规定学生在一定的时间内阅读几本相关的书籍，并写出读书心得甚至评论等，教师予以评分评奖。这样学生学有兴趣，学得主动，还可锻炼他们的自学能力、阅读能力和思维能力、书写能力。另外，要充分利用学校现有的电教设备，进行电化教学。因为电化教学具有直观形象、生动逼真、感染力强等特点，有助于使理性问题感性化、抽象问题具体化、深奥问题通俗化、复杂问题简单化。为此，师范院校就要对教师如何运用电教手段进行教学加以训练和指导。

最后，实施素质教育，必须加强师范院校与中小学的沟通与联系，互相反馈素质教育的有关信息；必须重视教育科学的研究，对成功的典型经验及时进行总结、研究和推广，共同推进素质教育的有效实施和深入发展。（作者系泉州师专政史系副教授 362000）

（责任编辑 周 宜）